

读《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

王雪燕

(厦门大学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从历史宏观角度来看,女性有一个从中心远离社会权力系统,又从边缘重新接近社会权力系统的过程。本文以女性在社会权力系统中的地位为研究点,探究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第三类女性的发展趋势如何化解女性双重道德标准的矛盾,并得出文章的结论。

关键词: 女性 社会权力系统 第三类女性

中图分类号: I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111(2010)06-0084-02

引言

在历史、现实、未来三大时间语境中,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呈现出边缘、接近、融合三大态势。在远古母系文化时代,女性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女性处于社会权力系统的中心。而随之到来的父系文化,它在诞生之初就以排斥女性为显著特征。父权文化在颠覆了女性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开始用社会暴力手段将女性逐出社会权力系统。此时的女性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她们已经患了失语症,失去了在社会文化层面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力;从社会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说,她们成了社会权力系统的被抛弃的“边缘人”;从阶级角度来说,她们是被压迫在的弱势群体;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她们是宗教要救赎与惩罚的对象。漫长的父权文化终于爆发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它唤醒了被权力抛弃的女性,女性开始走近了社会权力系统。本文通过学习《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一书,来探讨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的发展关系。

1 被遗忘的远古母系文化

父权文化极力将女性排斥出社会权力系统,并用一系列的理论来论证女性是如何不可能拥有权力,事实上,在父权文化之前,女性曾经处于社会权力系统的中心。那就是被父权文化遗忘的母系文化时代。原始氏族的群婚制与杂婚制,使后代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这时的男性仅仅是外姓客居人;同时由于男女两性的初次分工,男性狩猎受条件制约而收入不稳定,女性的采集则有稳定的收获量,这就奠定了女性在社会经济中的稳定地位。因此,此时的女性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女性被高度尊敬突出表现在远古时期的女神崇拜:中国的女媧、西王母、羲和,印度母神阿迪蒂,希腊地母盖亚,埃及的天神,日本的太阳神等均是女神。因此,远古母系文化时期的女性处于社会权力系统的核心。

2 隔绝权力系统

随着农业规模的扩大,生产工具的进步,产生了剩余产品。

私有观念的产生、扩张和父系亲缘选择下的婚姻、家庭,使母系向父系开始了大转变。女神一下子萎缩成了女仆,成为了无足轻重的陪衬人物:女媧成为了伏羲的妻子、复仇女神西王母成为老太婆等,都表明了父系文化通过一系列手段,对女性的压制,并极力将女性逐出社会权力系统。

父系文化权力系统对女性的剥离首先表现在对女性的身心的弱化处理。男权文化不遗余力地从生理现象入手,极力渲染男强女弱的天然法则,并将这一逻辑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强调了女性是劣等的性别,女性由于非理智只能是受支配的地位,父权文化下的思想家更是提出了“红颜祸水”、“蛇蝎女人”等丑化女性的思想。在这种父权文化下,男女儿童在社会化成长过程中被潜移默化地分裂了,他们从小就被告知男性才是强者,而女性是劣等的,如此女性不可能接近社会权力系统。男权在精神上弱化女性的同时,还弱化了女性的身体:楚国细腰、裹小脚、割礼等均是对女性身体的摧残,使女性不仅心理上认同于自己的弱势,更乐于将自己推向弱势。其次,父权文化还提出了女性“牺牲”的精神,女性应该呆在家里带孩子做饭,为男性排忧解难;女性应该逆来顺受;女性应该从一而终等。并且为了内化这些牺牲的理念,男权文化还为那些肯牺牲的女性颁发祠堂贞节牌坊,使女性坚定地认为应该为男性牺牲,即使是完全退出权力系统。在这个文化下:女人远离战争、远离政界、远离科学、远离哲学,却走进了后院厨房。父权文化对女性身心的双重弱化,使女性远离了社会权力系统。

3 接近社会权力系统

女性走近权力系统,首先表现为女性的政治参与要求。此时的女性向父权社会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给女性选举权!给女性参政权!女性政治权力的意识的扩大,并随之产生了许多女政客,这使她们开始慢慢接近社会权威系统。女性走近社会权力系统的另外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是女性教育的普及,教育不仅赋予了女性接近权力的能力,更扫除了女性内化的“牺牲”的心理。女性因此变得理智、科学、哲学,她们能够走出厨房,走进社会职业岗位,她们成为女经理、女总裁。女性职业地位的获得巩固了其社会经济地位,她们无需依附于男性而生活,她们敢于向社会权力系统索要自己的权力!

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女性想走近社会权力系统,就必须进行一场传统人格的革命。传统人格系统要求女性是贤妻良母、温柔体贴,她们想接近权力,必须摆脱这个人格的束缚;而传统人格系统要求男性刚毅进取,男性觉得太累,男性也可以居家带孩子,并认同女性拥有权力。因此,传统人格系统中男女性别的严格分裂将走向混合人格的发展,使个体精神获得更自由的空间,这样女性有

接近权力的心理基础,男性也可以认同于这种权力系统新结构。

4 第三类女性

女性从远离社会权力系统到走近权力系统,必然要求其走出家庭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然而传统的观念要求女性承担着“妻子”与“母亲”的责任,即使是女政客、女企业家也面临这样的矛盾:在家庭与事业不能同时兼顾时,如何化解双重道德标准?

法国的里波韦兹吉在其《第三类女性》中谈及三类女性的定义:第一类女性是饱受污蔑和歧视;第二类女性则过分被吹捧,它是男权对其理想女性的吹捧,最终建构的是男权视角下的女性,这两类女性都是男权理想的女性;而第三类女性则是女性自己理想的状态,她们具有自主性,能够发展个性,掌握未来,不再受传统人格系统的约束。她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发展要求索取权力,同时能够在权衡家庭与事业之间自主地进行取舍。这样就能够化解双重道德标准:女性之所以会面临双重道德标准,是因为她们选择家庭,将收到女性群体的压力,而选择事业则受到家庭成员的压力。但是第三类女性告诉我们,女性有自主权力,可以选择任何生活的权力,她们有权在权衡家庭与事业之间做出选择而不

受家庭成员与女性群体的压力,这样的女性才真正在接近权力系统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独立。

5 结论

解读历史宏观角度上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的关系,我们总结出女性从远古母系文化中的处于社会权力中心位置开始,逐步变成社会权力系统的边缘和底层人物,而随着思想意识的发展,女性重新走近了社会权力系统。然而由于长时间远离权力系统所形成的一整套关于女性人格系统此时给女性带来了一定的生活矛盾,但是笔者相信随着第一类、第二类女性的渐渐终结,第三类女性将得到不断发展,这使得女性不再受权力系统的排斥,同时能够在社会权力系统与女性自身的家庭生活之间自主地找到均衡。

参考文献:

- [1] 欧阳洁《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2000年,辽宁画报出版社。
[2] [法国]吉尔·里波韦兹吉著,田军晖、张峰译,《第三类女性》2000年,湖南文艺出版社。

(上接第79页)

3 母女融合——中西文化交汇

赛义德曾说“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1]在《喜福会》中,随着岁月的推移,每对母女最终都能以和解作为故事的结尾,在一定程度上也象征了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交融。母女两代,过去和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本身就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

出生在美国的女儿们想尽办法去适应和同化于周围主流社会的文化环境,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没有受过正式的中国传统教育,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乃至整个中华文化对于女儿们而言都显得遥远、隔膜。“中国”只是母亲们的絮絮叨叨,是她们不能完全理解的汉语,是神话般的故事。然而,她们与生俱来的脸庞和母亲们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使她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存留在她们的血脉中,无论凝固着还是流淌着。这些“传统”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思想。就像作品当中所展示的“……她是我的孩子,她天生是女孩;我又是我母亲的孩子,天生也是女孩。我们就像台阶一样,一级又一级,上上下下,但走的都是一条路。”^[2]被双重文化渗透,具有双重文化

意识,致使女儿们在用美国方式解决不了问题时,潜意识中的中国文化意识就会发挥作用,双重身份注定使她们在两种文化之间寻求出路。母女之间所经历的岁月的磨合最终表现出的认同实际上本身就是对中西两种文化的认同。

4 结语

《喜福会》承认差异,不回避冲突,而且它坚信经过碰撞与冲突,不同的文化将趋于和解,达到融合。人类心灵的共同联系必将超越文化的界限。不同文化的人最终将跨越信任与理解的障碍,达到互相沟通与谅解。

参考文献:

- [1] 赛义德. 赛义德自选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 谭恩美. 喜福会[M]. 田青,译.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
(施晶晶(1981-),女,陕西省西安市人,西安文理学院外语系教师,专业方向: 英语文学)